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1.04.003

毛泽东与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创立

王广锋

(重庆三峡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4100)

摘要:毛泽东是伟大的文艺理论家和实践家。新中国成立后,为实现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创立,毛泽东大力推动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文艺领域的根本指导地位,提出和发展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指导方针,推动形成了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原则,初步建构了以文代会制度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文艺管理体制。毛泽东推动创立的中国社会主义文艺为新中国文艺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关键词:毛泽东;社会主义文艺;文艺批评;文代会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1)04-0016-08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折射出一个时代的风貌、风气。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也存在着一个由新民主主义文艺向社会主义文艺转变、中国社会主义文艺逐步创立的过程。作为伟大的文艺理论家和实践家,毛泽东从根本指导思想、基本方针、重要原则、机制体制等方面,建构了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样态,为新中国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一 推动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文艺领域的根本指导地位

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文艺领域的根本指导地位,是新民主主义文艺向社会主义文艺过渡、确立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体现。毛泽东基于“立破并举”的实践逻辑,大力推动文艺领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运动,逐步清理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留存,帮助文艺界知识分子确立起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社会主义文艺创立提供了基本前提。

(一)大力推动了文艺领域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运动

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是改造思想观念、

提高政治素养的基本途径。新中国成立初期,文艺界知识分子大多数是从原国统区走出来的,对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知之较少、了解不多。即使是原解放区出来的文艺工作者,虽然一定程度上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但是将理论学习运用到观察、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的自觉意识和实践能力还很不够。因此,毛泽东积极鼓励文艺界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知识。在1950年6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要通过办各种训练班的方式,帮助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知识,“要让他们学习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①。1951年2月,党中央印发《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将理论学习分为“政治常识”“理论常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著作和毛泽东的理论著作”三个层级,体现出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教育规律,为文艺界理论学习提供了具体指导。文艺界在学习毛泽东著作时,尤其重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一文的学习。1952年文艺界以纪念《讲话》发表十周年为契机,掀起了深入学习毛泽东著作及其思想的高潮。《大众电影》《剧本》等文艺刊

收稿日期:2021-02-0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青年项目(17CDJ007);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项目(18SKSJ054)

作者简介:王广锋(1988—),男,河南驻马店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发展史研究。

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698页。

物先后发表一系列社论,呼吁全体文艺工作者坚定地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郭沫若、周扬、茅盾、老舍、赵树理、丁玲等文艺界知名人士,先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表达对毛泽东思想的坚定拥护。一些文艺爱好者在深入学习毛泽东著作之后,也表达出“要在文艺战线上,做一个勇敢的战士,做一个忠实的人民传递员”的坚定信念^①。

毛泽东还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成果对文艺界知识分子理论学习的促进作用。1951年7月,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撰写的《〈实践论〉解说》一文发表。《解说》以其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文风,全面系统地阐释了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实践论》的科学内涵及重大价值,受到文艺界知识分子的普遍欢迎。毛泽东看到后,十分高兴,特意致信称赞道:“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②许多文艺界知识分子正是通过阅读毛泽东的著作,破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逐步接受和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著名戏剧家曹禺为例。新中国成立后,曹禺一度为自己“不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而空虚,陷入了“却实在不能体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怎么回事”的精神苦闷。在用心学习毛泽东著作后,曹禺深刻剖析了自己作为“一个出身于小资产阶级、没有经过彻底改造的知识分子”的缺点,认识到了自己的精神“并不止于贫乏”,甚至还有“腐朽的东西”,坚定了“要逐渐把自己的思想情绪和工农兵的思想情绪打成一片”的决心^③。诸如曹禺这种思想层面发生的深刻变化,是文艺界知识分子学习毛泽东著作后的普遍现象。

(二)主持批判和清理了文艺领域中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文艺领域理念纷杂、歧见迭出。在文艺思想上,除了“解放区文艺思想体系”之外,还有“国统区文艺思想体系”“沦陷区文艺思想体系”“‘孤岛’文艺思想体系”三种文艺

思想^④。在这些思想体系中,有的是深受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思想的影响,有的是深受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有的是兼而有之。在毛泽东看来,只有大力批判和彻底清理旧的、封建的、资产阶级腐朽的思想残余,彻底改变文艺领域中混乱复杂的思想状况,才能真正确立起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为中国社会主义文艺提供生长空间。

主持发动了对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思想批判运动。1951年5月20日,毛泽东在为《人民日报》撰写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社论中,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演变和人民群众反抗封建统治的高度,批评文艺界未能认清武训及电影《武训传》的实质,反而“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这种情况“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他指出,应该歌颂的是一百多年来那些“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不是像“武训”那样“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的对象^⑤。随后,文艺界对武训和电影《武训传》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思想批判。对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体现出了毛泽东力图以清除文艺领域残存的封建主义价值观念,为创立中国社会主义文艺扫除障碍的努力。

大力推动了对胡风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文艺思想的批判。胡风是20世纪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新中国成立后,胡风在文艺创作上推崇主观体验,批评“概念化”“题材决定论”等现象,受到了文艺领域的持续批评。1954年7月,胡风将长达30余万字的意见书《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和一封长信提交党中央。在意见书中,胡风反驳了别人对他的批评,并对文艺理论界以及几年来文艺发展状况作了较低甚至负面的评价。1955年1月,毛泽东在给周扬的信上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文艺思想

①陈登科:《人民教导我写作——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中国青年》1952年第9期。

②《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75页。

③曹禺:《永远向前——一个改造中的文艺工作者的话》,《人民日报》1952年5月24日。

④柏定国:《中国当代文艺思想史论(1956-197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⑤《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49-1956)》,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231-232页。

“进行彻底的批判”^①。随后,文艺界开始对胡风及其文艺理论进行系统批判和清理。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是对20世纪30年代以来左翼进步文化阵营里“小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总清算”。毛泽东当然明白这些带有异质性价值倾向的文艺思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中国已经开启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新的伟大征程,这些历史上曾起进步作用的思想理念已经远远落后于社会主义现实,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阻抑因素,是需要加以清理和破除的对象。因此,毛泽东希望通过这一系列的文艺思想批判运动,为推动文艺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创立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开辟道路。

二 提出和发展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社会主义文艺指导方针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下简称“双百”方针)作为完整的文艺指导方针,是毛泽东在1956年反思“苏联模式”、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提出的。“双百”方针旗帜鲜明地反对文艺领域存在的教条主义、专制主义,正确反映了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现实要求,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原则和科学方法,是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得以创立的重要标志之一。

(一)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

“百花齐放”口号最早是针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戏曲界围绕京剧问题的争论提出的。1950年前后,戏曲界围绕如何看待京剧问题有很大分歧,一些人主张连同糟粕在内全盘继承下来;一些人将京剧视为封建主义遗毒,主张全盘否定。1951年4月,毛泽东应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之请,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②毛泽东主张以马克思主义辩证观点,继承发展各种传统戏曲形式和内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一科学辩证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赢得了戏曲界人士的广泛赞同。这一时期毛泽东提出的“百

花齐放、推陈出新”,只是解决了戏曲领域中不同流派和风格共存的问题,尚未在其他文艺体裁上运用和开展。此时的“百花齐放”口号,与“双百”方针语境中的“百花齐放”,无论在内涵还是在外延上,都有着显著的不同。1953年毛泽东在指导如何开展历史研究工作时,提出了“百家争鸣”方针。这为随后完整提出“双百”方针提供了基础。

1956年4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把“双百”方针作为繁荣和发展我国文化事业的一项基本方针^③。同年5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毛泽东从自然规律、历史发展规律的角度出发,进一步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文艺需要“双百”方针,这一方针“是有必要的”^④。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旗帜鲜明地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⑤在对“双百”方针的深入解读中,毛泽东强调文艺工作者在艺术问题上应享有充分的自由权利,认为“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⑥,明确反对利用行政力量随意禁止一种风格、一种学派。针对文艺工作中的是非问题,他强调应当通过自由讨论的方式、具体的艺术实践去解决,而不是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针对坚持“双百”方针是否会冲击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这一问题,毛泽东科学运用了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观点,强调:“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⑦毛泽东对“双百”方针的深入阐释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和思路,活跃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思想,一时间文艺创作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

(二)毛泽东大力推进“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

自提出后,“双百”方针受到国内外不少人的质疑。国际上,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赫鲁晓

①《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37页。

②《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35页。

③《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43页。

④《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44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9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9页。

⑦《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页。

夫的反应很具有代表性。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赫鲁晓夫记录了他听到“双百”方针时的反应:“关于‘百花齐放’的口号,我们决定不在报刊上发表。毛泽东并不傻,他知道我们的沉默是表示对这个口号的不赞成。”^①国内方面,1957年1月,《人民日报》刊登了由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所写的文章《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文章未能看到“双百”方针自实施以来的积极作用,而是片面夸大其消极影响,认为它减弱了“文学艺术的战斗性”和“时代的声音”,模糊了“时代的面貌”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文章还指出:“自从提出‘百花齐放’以后,有许多人只热衷于翻老箱底,热衷于走捷径去改编旧的。”^②另外,党内不少领导干部对“双百”方针的认识不深刻不到位,宣传和落实工作更是不及时不得力。毛泽东敏锐地发现围绕“双百”方针争论的背后是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想在作怪。随后,他在许多场合,多次强调坚持“双百”方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为之做了许多宣传解释工作。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深入解读了“双百”方针提出的历史背景和哲学依据,指出:“这个方针,……我看还是对的,是合乎辩证法的。”^③为了帮助人们正确把握“香花”与“毒草”的标准,毛泽东还根据宪法原则,立足于帮助人们自由讨论各种文艺问题,从是否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巩固民主集中制”“巩固共产党的领导”“国际团结”等方面进行阐释^④,这便是“六个有利于”政治标准。仅从字面上看,“双百”方针并没有明确的阶级属性指向,任何阶级都可以拿来为己所用。因此,“六个有利于”政治标准的提出赋予“双百”方针以鲜明的无产阶级属性,为其确立了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

(三)“双百”方针标识了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鲜明品格

在毛泽东看来,文艺创作是复杂精细的精神劳动,富有创造性、探索性、个体性的特征,必然会出现在观点、方法、体系、学派上的差异甚至对立

现象。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充分尊重文艺发展规律,将社会主义民主原则运用于文艺领域,解决了社会主义时期文艺发展中的是非问题,能够有效地推动文艺事业的健康发展。从逻辑起点和价值旨归两个维度上看,“双百”方针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思想精髓,揭示了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内在动力。一方面,“双百”方针的逻辑起点是提倡艺术上的竞赛和科学上的自由讨论,尊重人民群众的精神创造力和鉴别力,相信通过人民群众的文艺实践,克服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另一方面,“双百”方针的价值旨归是为人民服务。落实“双百”方针,意味着通过提供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艺产品,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精神需求,进而在文化服务过程中落实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双百”方针科学概括了中国传统文艺发展的客观规律,深刻总结了党领导文艺工作的历史经验,正确反映了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实践要求,是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创立的重要标志。

三 推动形成了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原则

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是文艺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通过深邃的理论思考和深刻的实践探索,推动形成了以“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革命的浪漫主义与革命的现实主义相结合”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原则,以及以人民性、历史性、艺术性相统一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文艺批评原则,为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创立提供了重要指导。

(一)提出和发展了以“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革命的浪漫主义与革命的现实主义相结合”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原则

推动确立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原则。“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诞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1942年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

^①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张岱云等译,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665页。

^②《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人民日报》1957年1月7日。

^③《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2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4页。

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①这一原则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成为指导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重要理论之一。1956年4月,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毛泽东强调:“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②同年8月,在与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毛泽东深刻把握了中国文化和世界文明交流互动的时代特征,立足于建构民族自信心这一逻辑起点,通过对中外文化、中外文艺之间异同的辨析,极大地拓展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原则的内涵和外延,为社会主义文艺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域和空间。其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如何看待中外文艺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毛泽东看来,中外文化各有优长,我们要敢于承认自身的缺陷和不足,积极向一切先进事物学习。针对如何看待建国初期文艺界存在的“不要学西洋的东西的人办事”现象,毛泽东指出:“要承认他们学的东西是进步的,要承认近代西洋前进了一步。”^③“中国某一点上有独特之处,在另一点上外国比我们高明。”^④他还以“小说”为例,坦率地指出:“外国是后起之秀,我们落后了。”^⑤二是学习外国东西的态度问题。毛泽东指出,“西洋的东西也不是什么都好”^⑥,我们要学外国文化中的好东西、有用的东西以及他们的长处,要反对全盘西化的教条主义态度,不能因为学习外国东西,“就对中国的没有信心”^⑦。三是学习外国东西的根本目的。毛泽东认为,学习外国有用的东西,“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⑧,要“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⑨。在谈话中,毛泽东十分重视形成“中国的”“中国自己的”“独特的民族风格”“民族风格的东西”,彰显了建构富有中国特色、民族

风格的社会主义新文艺的历史自觉性和自信心。

推动确立了“革命的浪漫主义与革命的现实主义相结合”(以下简称“两结合”)原则。1958年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原则。“两结合”原则起源于毛泽东1939年5月为鲁迅艺术学院周年纪念的题词:“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⑩这一原则将文艺创作中的革命理想与求实精神结合起来,集中体现了毛泽东围绕新中国文艺创作实践及其经验作出的新认识、新判断,是对源自苏联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文艺创作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文艺建设中“走自己的路”的创新成果。作为一个集中折射社会主义文艺创立时期文艺创作的理论命题,“两结合”原则成为指导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新准则、新方向。毛泽东不仅从理论层面推进“两结合”原则的形成和发展,还积极将之运用到自己的文艺创作实践,创作了大量震古烁今、独领风骚的经典诗词,极大地丰富了社会主义文艺成果,为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树立了光辉典范。以毛泽东晚年创作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为例。该首词以登井冈山为创作题材,在追忆往事、歌颂新中国之中,将崇高远大的革命理想和激昂慷慨的实践精神相结合,熔叙事、写景、抒情、议论于一炉,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思想要素高度融合的产物,是对“两结合”原则的完美践行和最好注解。

(二)建构了人民性、历史性、艺术性相统一的社会主义文艺批评原则

文艺批评是对文艺作品进行恰当的认识、判断和评价,科学总结文艺创作经验,促进文学家艺术家的文艺生产实践的社会活动。作为衡量文艺作品质量的基本尺度和标准,文艺批评在推动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健康发展中发挥着导向和引领作

①《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3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

③《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54页。

④《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52页。

⑤《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52页。

⑥《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54页。

⑦《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52页。

⑧《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53页。

⑨《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46-151页。

⑩《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4页。

用。毛泽东高度重视文艺批评的现实功用,将其视为“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①。毛泽东不仅建构了人民性、历史性、艺术性相统一的文艺批评原则,拓宽了文艺批评的理论生长空间,还积极参与到文艺批评实践中去,极大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文艺批评原则的深化发展。

毛泽东建构的人民性、历史性、艺术性相统一的文艺批评原则可以追溯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1942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中得到初步体现。在《讲话》中,针对文艺批评的“人民性”原则,毛泽东反复强调“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②。他要求文艺工作者在进行文艺创作时,要解决“为什么人”问题,站稳人民立场。针对文艺批评的“历史性”原则,毛泽东主张:“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③在文艺批评的“艺术性”原则方面,作为诗词大家的毛泽东深知艺术作品的审美特性,提出了“艺术标准”“艺术力量”的命题,将“艺术标准”放到极其重要的位置上,强调:“一切艺术性较高的,是好的,或较好的;艺术性较低的,则是坏的,或较坏的。”^④他指出,在坚持政治标准的前提下,要追求“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这是因为“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⑤。可以说,毛泽东从人民性、历史性、艺术性方面深化了人们对文艺批评基本原则的认识。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立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宏大历史场景,更加凸显文艺批评的人民性、历史性、艺术性之间的融合统一关系。1958年8月,毛泽东在与音乐工作者谈话时指出:“艺术有形式问题,有民族形式问题。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⑥这一论述体现出毛泽东建构文艺批评原则时融通人民立场、历史思维、艺术力量的高度

自觉。当然,毛泽东对人民性、历史性、艺术性相统一的文艺批评原则的把握和运用不是僵化不变的,而是基于不同文艺作品具体情况而呈现出动态平衡的状态。毛泽东建构的社会主义文艺批评原则,超越了简单解读型初级文艺批评思维,揭示了文学艺术创作的内在规律,确立了社会主义文艺批评实践的标准和范本。毛泽东并不是停留在空疏模糊的理论探讨层面,而是切实参与到文艺批评具体活动中去,以系统成熟的理论思考来指导社会主义文艺批评事业的健康发展。毛泽东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批判错谬、树立典范的实践理路,推动了社会主义文艺批评实践向前发展。批判错谬方面,集中体现在对武训和电影《武训传》、胡风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文艺理论等对象的集中批判。这些思想批判运动的背后,蕴含着毛泽东希望通过快速迅疾的政治运动方式,以实现文艺批评的社会主义转变的深层思考。树立典范方面具体表现为毛泽东以贯通古今的历史眼光和深邃思想,深刻剖析了大量具体的文艺作品、文艺人物、文艺形象,从而为做好社会主义文艺批评工作提供了光辉典范。

四 初步建构了以文代会制度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文艺管理体制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在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文艺管理经验、充分借鉴苏联文艺管理体制的基础上,推动形成了以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以下简称“文代会”)制度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文艺管理体制。文艺管理体制内容丰富,涉及文艺事业的方方面面。文代会制度有着严密的运行逻辑,具有思想导向、桥梁纽带、组织建构等方面的独特功能,在社会主义文艺管理体制系统中发挥着中心作用。毛泽东推动形成的社会主义文艺管理体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为保证文艺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而对其进行规范引导的努力和尝试。以文代会制度为中心的文艺管理体

①《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72页。

②《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7页。

③《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4页。

④《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73页。

⑤《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74页。

⑥《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47页。

制,集中承载和体现了新中国文艺管理模式的政治性质和组织特征,是文艺管理工作规范化、组织化的重要表现,为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创立提供了重要保障。

(一) 重视发挥文代会主题的政治导向作用

文代会被誉为“文艺界党的代表大会”。可以说,每次文代会的召开都集中折射一段时间内我国文艺机构运行、文艺思潮演变、文艺创作、文艺发展走向的状况。因此,政治导向正确与否至关重要。在文代会制度运行过程中,毛泽东高度重视大会主题的政治导向作用,注重发挥其对社会主义文艺管理体制的政治建构功能。

全国第一次至第三次文代会是在毛泽东亲自指导下召开的。在大会筹备过程中,毛泽东都会对大会议程、任务、指导思想作出重要指示和具体安排。他还就中国文联及各协会的领导人选,专门组织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加以商定,确保文代会能够始终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如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时,毛泽东亲临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了热情洋溢、鼓舞人心的讲话:“你们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们对于革命有好处,对于人民有好处。”^①在指导文代会筹备过程上,毛泽东尤其关注文代会主报告的起草工作。以第二次文代会为例。第二次文代会的主报告原初是由冯雪峰主持起草。由于冯雪峰起草的大会主报告未能充分反映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艺发展状况,毛泽东决定让周扬主持大会的主报告起草工作。据林默涵回忆,报告经由胡乔木送交中央政治局进行讨论,“毛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听取了周扬同志准备做的报告要点,一致同意”^②。在讨论中,毛泽东还对一些具体问题谈了自己的意见:“一、鼓励文艺创作,反对粗暴批评;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应从‘五四’算起;三、关于英雄人物形象的创造问题;四、关于文艺界的统一战线;五、对过去文艺领导机关的批评和错误,应该自由进行争论。”^③这些重要意见具有极强的政治性、实践性、理论性,为人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文艺的生成历程、把握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艺事业及未来走向提供了指引。

(二) 重视发挥以全国文联为代表的文艺团体的桥梁纽带作用

文艺团体是落实党对文艺工作绝对领导的重要载体,是确保文艺管理机制健康运行的基本依托。在全国文代会制度运行体系中,文联机构是党和政府联系文艺界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是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重要力量,有着独特的价值和作用。文联机构有着悠久光荣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成立的各种文艺组织和文艺团体。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出现的左翼文艺团体,以及解放区成立的文艺研究会、文艺界协会,为建国后成立文联组织提供了重要基础。新中国成立前夕,在郭沫若等人倡议组织下,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第一个全国性文艺团体——“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后更名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也随之成立,党和文艺界知识分子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了。

然而,如何看待和发挥文联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在第二次文代会筹备时,党内产生了分歧。当时负责文代会筹备工作的是长期担任毛泽东政治秘书、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胡乔木。胡乔木受日丹诺夫文艺管理思想的影响,主张学习苏联的文艺管理体制,取消各级文联,以便于各协会相互独立、平等地开展工作。胡乔木的这一想法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毛泽东认为,全国文联这一机构组织,虽然从工作性质上看很“虚”,不像各协会那样从事较多的实际业务,但是它能够为一些年纪大的、有贡献的艺术家们提供“坐在主席台上”“享受一点荣誉”的功能^④,是很有存在价值的。不主张取消文联,表露了他对艺术家们的一种爱护之心,同时也体现了他对新中国文艺管理体制和模式的深沉思考,注重发挥文联机构在团结文艺界人士中的重要功用。在毛泽东的推动下,第二次文代会对文联机构进行了必要的改组。此次改组奠定了全国文联和各协会的领导方式、组织架构、运行方式,形成了社会主义文艺管理机构的基本框架。

①《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页。

②黎之:《文坛风云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20页。

③黎之:《文坛风云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28页。

④陈晋:《毛泽东文艺生涯(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67页。

(三) 重视发挥文代会制度的组织保障作用

文代会代表是新中国文艺建设的人才基础,是社会主义文艺队伍的“雏形”,是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发展的重要保障。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文代会代表的产生有着详细具体的办法和方案,如制定文代会代表产生办法、成立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文代会代表分为正式代表、特邀代表、列席代表三种类型,是综合考虑地域差别和不同文艺门类的产物。因此,确保文代会代表人选的广泛性和代表性,是实现文代会制度健康运行的基本条件,是落实社会主义文艺管理体制的重要体现。

毛泽东高度关注文代会代表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希望借助文代会的成功召开增强文艺界的凝聚力,实现文艺队伍内部的“大团结”,为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而奋斗。1960年6月,第三次文代会筹备处向党中央请示文代会代表人选问题

时,周扬等人提出未撤销理事职务的“右派”分子能否参加大会的问题。中央书记处的回复意见明确表示应通知这些“右派”分子参加,并指出“有的代表人物仍可选为下届理事”^①。让“右派”分子参加这次文代会,是毛泽东亲自作出的指示。据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副秘书长的张僖回忆,在大会筹备会议上,周扬提到“右派”分子能否参加这次大会时,毛泽东明确表明态度:“右派还要请他们回来参加,请几个代表人物。”^②随后,丁玲、冯雪峰、舒群、黄药眠、黄源、吴作人、钟敬文等24名“右派”分子代表参加了第三次文代会。毛泽东对“右派”文艺代表人物的特殊关注和关怀,体现出他自觉维护和促进文代会制度良性运作的良苦用心。也正是毛泽东维护文代会代表的广泛性、代表性的自觉意识和切实行动,保障了社会主义文艺管理体制在历史曲折发展时期仍然能够得以前进。

Mao Zedong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Socialist Literature and Art

WANG Guang-feng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Chongqing Three Gorges University, Wanzhou 404100, Chongqing)

Abstract: Mao Zedong is a great literary theorist and practitioner.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New China,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socialist literature and art, Mao Zedong vigorously promo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fundamental guiding position of Marxism in the field of literature and art, put forward the guiding principle that “all flowers bloom together and all schools of thought contend”, developed the principles of socialist literary creation and literary criticism, and constructed the socialist literary management system centered on the system of the literary congress. It can be said that Mao Zedong promo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socialist literature and art, which laid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literature and art of the New China.

Key words: Mao Zedong; socialist literature and art; literary criticism; the literary congress

(责任校对 游星雅)

^①黎之:《回忆与思考——第三次全国文代会前后(下)》,《新文学史料》1996年第2期。

^②张僖:《只言片语——中国作协前秘书长的回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08页。